

# 试论 20 世纪 70 年代 海外保钓人士对两岸关系的贡献

刘玉山

(龙岩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福建 龙岩 364000)

**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中国留美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保钓人士发动了捍卫钓鱼岛主权的保钓运动,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来抗议美日之间的私相授受。保钓运动对他们有深远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日后都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保钓人士; 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3)05-0078-08

20 世纪 70 年代由台湾留美学生为主体发起的保钓统一运动开启了中国民间保钓的先河,其不仅对参与者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对两岸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今日。目前学界对于保钓运动的研究成果已有一些,但研究的视角放在保钓人士与两岸关系的论文还不多见,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做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 一、保钓运动期间保钓人士已经来北京对中央对台工作建言献策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两岸处于隔绝状态。1971 年 11 月 23 日晚 10 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保钓五人团,又叫“保钓零团”(李我焱为团长,包括陈治利、陈恒次、王春生、王正方),一直到凌晨 4 点结束,谈话持续 6 小时,第一次架起了沟通海峡两岸的桥梁。这 5 名保钓运动的代表回到美国后,引起极大的轰动。他们把访问祖国大陆的见闻介绍给广大的旅美台胞,旅美台胞中由此涌现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积极分子,这批人萌发了回国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念头。陈治利当时提出建议:中国宣布说钓鱼岛是我们的靶场,日本就不敢登陆上去了。结果过了四五天之后报纸真的刊登了出来。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恒次建议以后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同时还要照顾到台湾同胞的感情,还应加上“台湾人民是祖国的骨肉同胞”,“以后这句话屡屡出现在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 A 类研究项目“1970 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保钓统一运动研究”(JA12304S);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全球华人第一次保钓运动研究”(1970—1980)”(13YJC770033)

**作者简介:** 刘玉山,男,安徽蚌埠人,龙岩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

各宣传文字中”。<sup>[1]</sup>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联大的演讲就加了这一句。事实上,在制定对台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台湾人民特殊的历史经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感情。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1月1日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告台湾同胞书》,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告台湾同胞书》揭开了海峡两岸关系的新篇章,正式确立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里面有这样的文字表述“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sup>[2]</sup>

以后周总理又陆续会见了“保钓一团”、“保钓二团”以及一些美国华人专业科技团体和著名学者,他们大都参加过保钓运动,也都就专业上的问题等提出了建议。就两岸关系而言,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11月,保钓左派许登源、陈妙惠夫妇来北京向中共中央反映对台工作意见,他们和先前已经回国服务的林盛中一起起草了《对台工作意见书》,请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转交给周总理。许登源是保钓运动中的著名理论家,很多保钓人士转向统运,都受到许的影响,这可以从很多保钓左派的回忆录看得出来,其中林盛中就直接跟许登源一起在保钓运动转入统一运动后在美国进行统运的工作。就他们所提的对台工作意见建议来看,有些已经在落实和实施,由于是本省人,他们以本省人的经历和心理状态反映出来的报告可以说反映了普遍的台湾本省人的心声,我们不妨列出来:第一,台湾省籍同胞由于台湾曾被割让给日本,当了50年的亡国奴,饱受屈辱;二次大战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迎来的却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以至于发生“二二八事件”。由于这两次痛苦的经历,造成一部分台湾人民认为来自大陆的统治者都对台湾人民不好的偏激心理。这部分人心中的伤痕需要大陆方面以理解他们的心理和给予更大的关怀来抚平。第二,广大台湾同胞与中国共产党无冤无仇,希望中共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由“武力解放”改为“和平统一”。第三,希望中共中央更多地听取台湾同胞的意见,在两岸还不能正常往来的情况下,由大陆同胞推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台湾省观察团,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他们反映台湾同胞的意见,并通过他们把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传达给广大的台湾同胞。<sup>[3]</sup>周总理向中共中央反映这些建议后,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意见。1973年中共十大,设立了中共台湾省代表团;1975年全国人大开始设立台湾省代表团,由13位大陆台胞组成,其中有两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而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则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得到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国外侨胞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邓颖超同志在1985年3月6日第二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中指出“关于统一祖国,台湾回归的方针问题。一九七九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了《告台湾同胞书》,一九八一年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九条’方针,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使海峡两岸同胞避免战争的灾难。我们提出这样的方针政策,完全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新形势,特别是征求了国外国内的各界华侨、华裔知名人士的意见,同时也和台湾许多同胞、国内广大的各族人民交换了意见以后确定的。‘九条’是照顾到台湾岛内各界同胞利益的,是从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这说明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诚心诚意的。后来,我们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明确地提出由国共两党来谈判解决台湾问题。”<sup>[4]</sup>《今日中国》(中文版)记者在1984年台湾同学会三周年庆祝会报导中也说“在北京,台湾同学会已逐渐成为一个活跃的团体。它曾参加了新宪法的修改草案和关于祖国统一的九条建议案的讨论”。<sup>[5]</sup>毫无疑问,《告台湾同胞书》以及叶剑英同志提出的“九条”方针听取了20世纪70年代参加保钓运动后归国台湾学人的意见,保钓统运先驱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所做出的开拓性工作功不可没。

## 二、保钓运动的后续和发展——中国统一运动， 高举祖国统一的大旗，与保钓右派和“台独”势力作斗争

保钓运动初始，为了团结最广大的钓运群众，在游行中大家不打任何旗号，发展到1971年中下旬，随着台湾当局对待钓鱼岛问题上的软弱以及对于美国保钓群体的迫害、打击，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强烈反感，“安娜堡国是大会”上最后通过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用岛内著名统派人士陈映真的话说，“这是一九五〇年在新帝国主义干涉下中国民族分裂对峙以来，第一个由海外爱国主义运动正式提出克服民族分裂构造，并呼唤民族团结的先声。一直到今天，民族统一的言论与行动不曾中断，至最近的二〇〇五年三月《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我们的民族统一运动又进入新的阶段。但历史不曾忘记，海外的统一运动是钓运，早在1971年开始提出的”。<sup>[6]</sup>于是保钓左派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支持台湾当局的保钓右派分道扬镳，保钓左派为了促进中国统一运动，通过播放反映祖国大陆建设成就的电影，举办读书会、讨论会提高理论水平，走入华埠，进行宣传，打破为台湾当局所垄断的华人社会圈子等方式在北美大陆树立起了第一面祖国统一的旗帜，他们与保钓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自己编印的刊物上对右派进行“讨伐”。中国统一运动促进了北美华人社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识和认同，促进了广大青年学生政治上的觉醒。

除与保钓右派进行“文攻”外，保钓左派还对由日本转入美国刚刚抬头的“台独”势力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保钓时期与“台独”的斗争，主要是在美国，当然核心是思想、意识的斗争。早在1970年12月26日出版的《大风杂志》，保钓健将龚忠武、徐笃、张系国、邵知本就发表《海外中国青年的呼吁》，坚决反对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指出：第一，在各个民族都力求团结统一，甚至组织联邦的时代，分裂中国的“台独运动”根本违反历史潮流的发展。第二，“台湾独立”事实上符合美日的国家利益，却牺牲了中国的利益，一定要认清“台独”的本质。<sup>[7]</sup>1972年旅美台湾长老教会在纽约成立“台湾人民自决运动”的组织，长老教会的牧师们搞政治搞得太凶，引起人们的不满，外界的批评愈来愈多。1975年7月底宋泉盛牧师在纽约发表了“三段论”，他说“人是政治动物”，“教徒是人”，所以“教徒也是政治动物”。保钓健将张系国在《星岛》写了一篇《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对这种“三段论”予以批评。<sup>[8]</sup>1973年1月纽约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发行的《钓鱼台》杂志发表草地人的文章《“唯独论”毒药》和署名“纽约钓运学习小组”的《对台湾“独立运动”的几点小意见》这两篇文章。前者将“台独”比喻成毒药，将“独立组织者”蛊惑人心的手段和心理剥离得一清二楚，指出“唯独论”者的本质：我们大略可以看出在卖“独立”膏药的江湖郎中，表面上只是迎合观众心理的机会主义者，为推销“毒力丸”而宣传广告“独立”是万能膏，实际上却是为了资产阶级和买办服务，他们的丸药没有科学和实践根据，不但治不好人，对受“毒蛇”危害的工农百姓，反而有延误时间伤害生命的危险。<sup>[9]</sup>后者认为“台独运动”虽然有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一面，但仍然是反动、落后的。<sup>[10]</sup>保钓健将林盛中1972年7月16日在《群报》发表《对“台湾独立基于民族自决原则”的概念之批判》一文指出，根据列宁的论述，民族自决的原则，只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并未受到民族压迫，因此台湾的汉族人民是没有民族自决权的。尤其在大陆广大地区已经实行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以民族自决作为“台湾独立”的借口，是一种极端反动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列宁主义。<sup>[11]</sup>1971年11月30日“台湾独立联盟外交事务负责人”陈隆志在布朗大学做了三次谈话，一次是英文演讲，主要对象是一些对亚洲问

题有兴趣的美国教授与学生;一次是晚餐,聚餐者都是台湾同乡;一次是座谈会,与会者是一些布朗大学的中国师生。有个笔名苦练脚的人亲临了三次谈话现场,作者对陈氏的一系列言论进行了驳斥。比如座谈中有同学问“全民自决与‘台独’是有区别的,如果现在让台湾人民自决,你怎么知道你称的‘台独’一定是大多数台湾居民的选择”?陈氏回答“台湾人民的自决与我们主张的‘台湾独立’在实质上没什么区别”。苦练脚认为这是“台独分子”极力企求弄出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台湾共和国”来保持某一阶层人的特权与利益。陈氏到现在还不能深切了解台湾的真实社会情况,不能去看看二十几年来台湾同胞在怎样的思想控制下,大陆是怎样在二十几年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是有别于蒋介石集团的,这些都是“台独”领导人应该反省的。<sup>[12]</sup>1972年10月《燎原》第4期发表了马夫的文章《评陈隆志君的“台独”论调》,对于陈氏上窜下跳地蛊惑人心进行了逐条批驳。陈氏认为“台湾人民受到蒋政权的欺凌压迫”。文章指出,受蒋集团压迫的是小公务员、小商人、店员、农民、工人等,绝不是勾结蒋家国民党在地方搞选举的贪污政客,也不是勾结政府的投机财阀。陈氏又怎么会为真正受苦老百姓申冤呢?陈氏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归属应由台湾人民自决”。文章指出,陈氏错在将“台湾独立”说成“台湾人民自决”,所谓人民自决当然要全体人民都明了事实才能自决,台湾的小公务员、工人、农民受到大陆建设精神的影响,才不会跟陈氏喊“独立”,为台湾垃圾们申冤呢。陈氏认为“中国政治恐怖,台湾人应自建国家”,文章指出陈氏的叫嚣完全是“中央日报”社论的口吻,中共是好是坏,只要客观去研究就一目了然,建议陈氏去耶鲁大学图书馆阅读有关资料后再出来说话。文章最后总结道:陈氏对“台湾独立”的论调,只不过是无聊的幻想家,为了追求他的幻想,也学会国民党造谣、恐吓的本能,对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又怎么能为台湾人谋福利呢?<sup>[13]</sup>

1977年8月份,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等发动会众寄发一份《宣言》给卡特总统,《宣言》说:“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愿望,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急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sup>[14]</sup>随即10月份,岛内统派《夏潮》杂志刊出北屋的文章《从致美国总统卡特的一封信说起》,揭露高俊明等的《宣言》不当。保钧健将王晓波撰文《上帝主张分裂中国吗?》指出了高俊明等人之主张,由外国“采取最有效的步骤”而建立的“新”国家,其实就是外国的傀儡政权,傀儡政权何能称为一“独立”国家?所以,高俊明等所称的“新而独立的国家”实质上是一“新而不独立的国家”,是改变台湾政治现状以建立一外国的傀儡政权。文章最后指出:希望高俊明等人不要再使教会堕落成帝国主义的工具。若彼等执迷不悟,一切长老会的教友,为拯救教会的堕落,有权起来展开抵制斗争。<sup>[15]</sup>

统运群体在美国高举祖国统一的旗帜,对正在美国咄咄逼人、沉渣泛起的“海外台独运动”当头棒喝,他们或是利用统运刊物直接写文章批判“台独”,或是在现实生活中与“台独”人士做坚决的斗争,在海外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尊严与统一,扩大了在美华人界对“台独”势力卑劣行径的认识,在与“台独”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也宣传了社会主义,扩大了社会主义祖国在美国的影响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统运人士即已与“台独”势力做坚决斗争并给予痛击,这种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是充分值得肯定的。

### 三、保钧统运人士再出发——20世纪80-90年代与李登辉、陈水扁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台湾“解严”后,“台独”势力的大本营逐渐向岛内转移,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成立之初其领

导权基本上为“台独”分子所把持，“台独”思潮在党内泛滥。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独联盟”这时也迁回台湾，集体加入民进党。1990年至1992年又有十多个“台独”组织在岛内成立，台湾岛内分裂势力日益猖獗。李登辉上台后坚持分裂主义路线，推行“明统实独”的路线，纵容、扶持“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使“台独”势力迅速发展，两岸关系持续紧张。难怪有学者称，蒋经国留给台湾社会的是追求国家统一、开放两岸探亲、开启政治改革等等政治遗产；李登辉下台后，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两国论”、民进党上台、“台独”活动猖獗等等政治遗产。李登辉治台12年，给台湾社会和两岸关系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李登辉当政的后期，分裂主义路线在大陆政策中的表现更加明显，政治上寻求“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定位；经济上抛出“戒急用忍”的限制性措施；文化上出现了“去中国化”的倾向。<sup>[16]</sup>陈水扁上台后多次否认“九二共识”，提出“一边一国论”，给两岸关系不断制造麻烦和摩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鉴于“台独”气焰嚣张，老保钧程君复、黄哲操、徐守腾、花俊雄、董叙霖、董庆圆、熊玠、印铁林、沈己尧、王中等人在70年代保钧运动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反独促统”运动。1999年全球性的“反独促统和平统一中国”促进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香港召开，接着在德国柏林、美国华盛顿、中南美洲巴拿马、日本东京、澳大利亚悉尼、巴西圣保罗以及美国芝加哥相继举行了大会，各地区性的“反独促统”大会多不胜数，每当“台独”势力很嚣张的时候，总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通过举办座谈会、演讲会、节日纪念会、记者招待会等宣传中国的和平统一政策，揭露和批驳一切不利于中国和平统一以及分裂祖国的种种谬论和“台独”阴谋活动。正如程君复所说，“全球反独促统大会”是一些关心台湾2200万人民未来福祉的台籍人士在海外的民间组织倡导发起，得到了海峡两岸的呼应，星星之火正在燎原。这是希望两岸以和平谈判，结束中国内战，两岸同胞能携手共创21世纪的繁荣，经由两岸交流、合作、三通而达到两岸和平谈判。这是台湾岛内以及海外华人数人的愿望，也是两岸当政者应当严肃考虑的政策选项之一。<sup>[17]</sup>海外华人华侨自动自发地从2000年至2003年在世界多个国家召开“反独促统”大会，反对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搞分裂，同时要加速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在多次的大会中，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要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需要唤醒全球华人华侨，更寄望台湾岛内的同胞，同时也要向美国主流社会与媒体作深入解释和说明，使美国人民知道，中国的和平统一是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及世界和平的。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中美关系就不会正常化，甚至倒退、恶化。中美关系影响两国人民之间的根本利益，甚至于子孙的安危，目前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制止“台独”，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

如今老保钧花俊雄担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印铁林担任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当年费城保钧统运中坚程君复于2000年当选为“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会长，2002年当选为“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会长，为“反独促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长期积劳成疾，程君复先生于2005年不幸去世，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先生身居海外，情系中华。早年满腔热血，积极投身‘保钧’运动。为推动中美交流与合作，几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尤其近年发起成立‘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并担任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会长，为反‘独’促统事业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拳拳赤子之情，令人感佩！”<sup>[18]</sup>

#### 四、以保钧学生为主的回国服务人员建立台湾同学会，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

从保钧运动到文革结束，由于国内形势，国家只批准十多位海外学者回国工作，1977年邓小平复

出后,国家建设需要大批科技人才,于是国家科技干部局着手引进海外台湾专家学者,仅1978—1980两年间回国工作的台湾专家就有100多人。这些保钓与统运人士回国后除了发挥专业所长,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出力献策外,更继续发扬保钓与统运的精神,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早日实现而四处奔走。为了加强团结,同时更为了对祖国统一大业继续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在老保钓夏平生、林盛中、吴国祯、杨思泽、邓子久、廖秋忠等的倡议下,1981年11月3日在北京成立了“台湾同学会”,第一任会长林盛中说道:“台湾同学会的目标是与保钓运动的目标一致的,都是希望祖国富强,都是希望台湾与大陆早日统一。可以说台湾同学会的成立是保钓运动在国内的延续。”<sup>[19]</sup>台湾同学会继承了保钓运动的精神,为了祖国富强,为了两岸关系发展,最终实现和平统一,兢兢业业,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中央的重视。<sup>[20]</sup>

在这里简单介绍几位台湾同学会成员也是老保钓的活动:林盛中,美国布朗大学地质系博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1972年回到祖国大陆后,积极参与对台交流交往,任多届台湾同学会会长,为增进两岸同胞的感情联系,为两岸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贡献,不幸于2011年底去世。吴国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化学博士,1977年回国,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吴国祯长期担任台盟中央副主席,写过《在历史面前》一书,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自己的见解,积极为两岸关系建言献策。杨思泽,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1979年回国任中科院核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廖秋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中国社科院第一位语言学博士,廖博士为此不惜与国外的妻子离婚,只身带着年幼的孩子回国,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于1991年病逝。夏平生也于1979年回国,担任我国中央电力部副总工程师,后返美,被我国能源部门、水力、电力部门、航天部门、电子工业等部门聘请担任科技引进和科技产品输出工作,夏先生先后参加过我国的小丰满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刘家峡电站、汉川电站等16家大型电站的新建和改造工程的建设和技术引进工作,并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和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对我国电力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李椿萱,将流体力学用于航天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苏纪兰,长期致力于物理海洋学环流动力学研究,也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二人于1980年回国。

台湾同学会在1981年到1987年举办了多次讨论会,其中1987年的讨论会,邀请的海外朋友很多,在台湾问题方面有学者就“一国两制”和民进党的出现对台湾政局的变化做了论述。会议结束时,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讲话勉励大家“你们是把学术问题,把一个原来很狭窄的问题提高到跟国家统一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祝你们在为社会、人类的进步事业中,为祖国当前伟大的改革工作中和‘一国两制’统一国家的伟大任务中,做出你们出色的贡献”。<sup>[21]</sup>以后的每一个年会,台湾同学会都会就一些专题召开讨论会,其中两岸关系是核心的议题。1987年末,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台湾同学会随即把工作重点转向岛内同胞。1988年2月初举办了海峡两岸作家研讨会,开两岸学术直接交流风气之先。在这之后举办的讨论会,除了邀请旅居海外的台湾学者专家外,更注重邀请岛内的学者专家。台湾同学会还接待过几批台湾的大学生访问团,效果非常好。台湾同学会的成员在两岸交流中有独特的优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虽然早年留学海外,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现在仍有很多亲属在台湾,在台湾有很深的社会关系;他们普遍具有高学历,大多是硕士、博士,有一些人现在是中科院院士,因此他们在台湾的同学好友也多是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这些优势决定了他们在从事两岸交流的工作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近年来为保存保钓统运文献,台湾同学会推动了统运文献《春雷声声》、《春雷之后》和《增编》(上、下册)的出版,也为学界的研究工作做出

了贡献。

## 五、进入联合国工作、关注中国教育,为两岸交流积极奔走

国内由于“文革”英语人才出现断层,导致20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一时派不出精通英语的人选,于是一批左派保钓人士如李我焱、龚忠武、陈恒次、刘大任、郭松棻、傅运筹、夏沛然、花俊雄、林国炯、汤锦台等就地报国,进入了联合国工作,有些甚至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李我焱,当年公认的全美保钓领袖,先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后到联合国环境规划总署工作19年,最后做到助理署长。因为担任中国环保工作的联合国协调人,他多次回国协调指导一系列合作项目,对祖国的环保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刘大任和郭松棻,进入联合国秘书处服务多年,他二人还是著名的作家,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对祖国深深的眷念,如刘大任的《红土印象》、《杜鹃啼血》、《浮游群落》、《远方有风雷》等,郭松棻的《奔跑的母亲》等。陈恒次,联合国任职期间不幸在出差非洲时死于飞机失事。花俊雄,曾任美国纽约华人华侨联合会秘书长,现任常务副主席,1993年至今,担任美国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为两岸统一积极奔走。龚忠武,在繁重的联合国工作之余,关注祖国统一大业与国内发展,《盛世诤言》等著作是其对上述问题观察思考后的结晶。林国炯,在联合国从事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20年并在其中担任了重要工作,为联合国裁军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汤锦台,在联合国工作之余,积极从事台湾历史的撰述,《大航海时代的台湾》、《千年客家》等反映了其对祖国文化的思考和强烈的赤子之情。

保钓运动中牺牲最多的两位典型是林孝信和周本初。前者作为保钓发起人,全身心投入保钓运动,被台湾当局吊销“护照”,在美国沦为“黑户”近20年。回到台湾后,积极践行社区大学和通识教育理念,为两岸的教育交流竭尽全力。周本初,当年也因积极参与保钓而耽误了博士学位,在其55岁才拿到博士学位。前两年周先生从美国休斯顿大学退休后又义务到吉林大学工作,为国家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为祖国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2007年9月,周先生将自己保存30多年的12箱“保钓、统运”原始文献资料捐赠给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构成了北京清华大学保钓统运资料的主体,目前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已成立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对保钓统运资料进行更加专业系统的整理、研究工作,可以说周先生这次的捐赠义举又为学术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老保钓为主在纽约成立的“科技教育协会”以及在台湾成立的“中华滋根协会”,多年来致力于改善大陆的基础教育、女童教育,为两岸的教育交流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 [1] 《那一夜 我们在新疆厅》,王正方《我这人话多》,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
- [2] 《一个中国论述史料汇编史料文件(一)》,台北“国史馆”2000年印行,第486页。
- [3] “林盛中访谈”,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上),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 [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 [5] 修瑭《一棵春苗在成长——台湾同学会成立三周年》,《今日中国(中文版)》,1985年第1期。
- [6] 陈映真《突破两岸分断的构造,开创统一的新时代》,龚忠武等《春雷之后》(一)“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第6页。
- [7] 1970年12月26日《大风杂志》第二期,第48页。
- [8] 引自张绍达《旅美台湾长老教会与“台独”》,龚忠武等《春雷之后》(一),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第210页。
- [9] 草地人《“唯独论”毒药》,龚忠武等《春雷之后》(一),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

- [10] 纽约钓运学习小组《对台湾“独立运动”的几点小意见》,龚忠武等《春雷之后》(一),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第185-187页。
- [11] 林盛中《对“台湾独立基于民族自决原则”的概念之批判》,龚忠武等《春雷之后》(一),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第183-184页。
- [12] 苦练脚《评陈隆志先生的三席谈话》,保卫钓鱼台布朗第二分会《新境界月刊》,1971年12月27日,第2-4页,文件编号06-000-089,自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
- [13] 马夫《评陈隆志君的“台独”论调》,《燎原》第4期,1972年10月,第12-14页,文件编号06-000-212,自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
- [14] [15] 王晓波《上帝主张分裂中国吗?》,龚忠武等《春雷之后》(一),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第202-208页。
- [16] 张文生《李登辉分裂主义路线的社会与政治根源》,《台湾研究》2010年第4期。
- [17] 《致陈水扁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龚忠武等合编《程君复先生纪念文集:一位海外爱国华人的楷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26页。
- [18] 龚忠武等合编《程君复先生纪念文集:一位海外爱国华人的楷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64页。
- [19] 林盛中《从保钓运动到台湾同学会》,《春雷声声》,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第656页。
- [20] [21] 林盛中序言,见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下),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年,第21-22页,第244页。

(责任编辑:张文生)

## On Contributions to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Made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Diaoyu Islands in the 1970's

Liu Yushan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activists in the U. S. A. , mainly with the Taiwanese students as the dominant factor , launched the movement to defend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Diaoyu Islands in 1970. They held a series of rallies and demonstrations to protest the illicit transfer of the Islands made between the U. S. and Japan. The movement has produc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m. As a result , many of whom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across the Straits in the later years.

**Key Words:** activists in the movement to defend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Diaoyu Islands ,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 peaceful development